

上帝对你缺失的爱,我来给

听你的人生故事



何肖龙律师(左一)在为精神残疾人及家属提供法律咨询。 王志浩 摄

听你的人生故事

我出生在江山的一个农村,家徒四壁,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打过补丁的。听妈妈说,我在100天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,让原本就很穷的家里雪上加霜。从小学到初中,我一直在吃药打针。但是改变不了的是,我左腿的肌肉、皮下脂肪、肌腱和骨骼还是发生了萎缩。也因此,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一些,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。

从小我就知道自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,我不能到处跑跳,只能躲在家里看父亲给我买的《绍兴师爷的故事》。但也正是这些伸张正义、惩奸除恶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。长大了的梦想是什么呢?关键是要能除暴安良。

读高一的时候,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。当地政府有个公益活动,由政府出钱为我的左腿做矫

正手术,主治医生来自新加坡。医生将我左小腿的骨头截断再做拉伸,以延长左腿的长度。在做完手术的第二年,我拄着拐杖重新回到学校读高二。虽然与班里的同学刚认识,但是团支书和班长每天热心地替我蒸饭、打菜;同寝室的同学还帮我洗衣服。

人要学会感恩。政府和同学对我的好,我都深深记着。我告诉自己,总有一天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回馈社会。

高中毕业,我顺利考入杭州大学法律系。我清晰地记得,一走进校园,就在教学楼前看到了一个大横幅:欢迎你,未来的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。多么神圣的工作啊,以后我会是这其中的一员。想到这些,我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

从小的梦想——匡扶正义

第一封信:我终于走上了律师路

1997年我大学毕业,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。因为是残疾人,我无法加入到法官、检察官的公务员队伍中。做一名好律师,这是我毕业时的信念。

第一年律考,没有通过,我回到衢州,在一家律所当律师助理。那个时候既要准备第二年的律考,还要挣钱养活自己,从心理到体力都是一种透支。

因为刚出道没有案源,我只能通过亲戚朋友介绍,到很偏远的地方接些小案子。那时从市区到村庄都没有直通车,我只能先坐车到镇上,从镇上到村里当事人家中又得走上五六里路。这段路程对于平常人而言不算长,但是对于我的左腿却是一种负担,每走

一步都是钻心地痛。2000年,我通过了律考。第二年,我与普通人一起通过了岗前培训。当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拿到律师执业证时,唯独我被告知,我的人事材料不齐,执业证办不出来。可是我所有的人事材料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起就放进了人才市场,怎么会不齐呢?

于是,年轻气盛的我直接给当时的省司法厅厅长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。两个月后,我接到了杭州来的电话,让我到省司法厅律管处领取律师执业证。

捧着这张来之不易的律师执业证,我有了一个信念: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,帮残疾朋友做些事情。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不易,我懂。

第二封信:我与更多残疾人牵起了手

2005年,我来到杭州,应聘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。我将自己安顿下来后,便先后给省残联、杭州市残联各写了一封信,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们,希望能有机会在法律上为残疾人提供一些帮助。

省、市残联先后都给了我答复,我逐渐接触到更多的残疾人,了解他们的困难,并通过法律途径为他们提供帮助。

2007年,省残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,他们一直想帮助一名残疾人解决棘手的劳务纠纷案,但是案子拖了两年多了还是没有解决。两年前,湖州市一家企业的一名员工因个人原因导致精神残疾,被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,但是单位没有支付相应补偿。该员工的监护人就找残联帮忙要补偿款。可是当残联找到

这家企业时,企业以“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已经过了”为由,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
法律不外乎人情。虽然时效已过,但从情理上来说,这名残疾人在单位已经工作了十几年,临了补偿一些生活费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正是出于这点考虑,我与残联的工作人员几次与企业及企业的主管部门交涉。终于,我们达成了协议,企业同意一次性补偿十多万元给她。但为了确保这些钱能进入残疾人本人的口袋,我们要求企业将补偿款打入残联的账户,由残联每月拨出固定的金额到这名残疾人的账上。

也许因为这次的成功,省残联对我多了一份信任与支持。2008年,省残联正式聘请我为法律顾问。

后记:

为残疾人打了那么多年官司,何肖龙深深地感受到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在逐年加强,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权益。不过,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的实施细则,很难落到实处。

他一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完善法规,让弱势群体能真正受益。

他说,虽然自己的精力有限,但是他想在有限的生命里,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,让上帝缺少关爱的人能够感受到社会给予的更多关爱!

第一次听闻何肖龙律师,是因为他帮一位残疾人企业打赢了官司。而且,他不止替一位残疾人打官司,他在一年中通过电话、面见等方式为残疾人提供的法律服务有100多起。

第一次见到他,是在一次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公益活动现场。来寻求帮助的妇女同胞们笑着说,他们喜欢这个温文尔雅的何律师,一个大男人不仅乐意听她们叨叨,而且能从男性的角度帮她们分析家庭问题。

12月21日,在他的律所里再见到他时,我才知道,他自己也是位残疾人!而且他在新开业的律所的章程里写下了这么一条:本所特别为残疾人提供便捷、有效的法律服务,维护其合法权益,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,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。”

冬日的杭州下沙寒风凛冽,但室内被阳光照得很温暖。我静静地倾听着何肖龙的故事。

第三封信:用实力证明了自己

今年年初,我收到了来自老家一民营企业家朱文的一封邮件。信中他告诉我,他被商业合作企业诬蔑,连输了两场官司。但是他不服气,希望我能帮他打二审的官司。

朱文跟我一样也是残疾人,他因车祸失去右腿后,创办了江山市自强化工厂。2008年,他被一家原先的合作企业起诉到法院。该企业称在2007年7月,自强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杨某与其签订了购销协议一份,由自强化工厂向其购买价值17.945万元的货物。该企业要求自强化工厂支付货款及6万多元利息。但是朱文说,这份购销协议是伪造的。

一审朱文败诉,于是他向检察机关申诉,由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,一审法院重审本案,但还是维持了原判。

接到这个案子后,我理解朱文这几年走得很难。一个残疾人自己做企业本身就很难,还要被官司牵绊着,实属不易。

我们的交流、探讨没有隔阂,都是残疾人,所以很多事情都能理解。达成默契后,我们找到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来鉴定这份购销协议的真伪。果然如朱文所说,这份材料是伪造的。有了这个充分的证据,我们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上诉。同时法院也查明杨某是在做伪证。

最终,二审我们胜诉了。在法官法槌落下的那一刻,我们两人抱在了一起。事后,法官还笑着跟我们说:很少看见律师和当事人都是残疾人的。虽然你们是残疾人,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
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辛苦,但我觉得收获很多,我证明了自己的业务能力,也有信心能为更多的残疾朋友找回他们应有的权益。

今后的梦想——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

在我接触的这些残疾人中,很少有像朱文这样坚强地办起企业、生活相对富足的。他们大多数还是生活比较困难,一旦遇到困难,很难请得起律师。我萌生了自己办一家律所的想法。有了自己的律所,我就能更自由地来帮助他们。今年11月,我的浙江佐钊律师事务所成立了。如果是法律援助的案子,那么我完全是公益性地做;如果当事人家里经济困难,但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,那么我只会收取办案所需的成本费用。也正因此,律所虽小,却可以让广大残疾人朋友觉得温暖。

同时,在帮助女性残疾人的过程中,我发现很多妇女被家暴侵扰,她们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怀。我觉得自己有这个精力,就将帮助范围逐步扩大。我参加了杭州市妇联组织的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活动,每周四去江干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做婚姻家庭导师。